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 机制研究

朱一鑫

[摘要] 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的重要部署。本文基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和老年人生活状况”专项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参与类型可以划分为“受惠型”“协同型”“利他型”和“低参与型”四类；相对于“低参与型”，其他三类参与模式会显著提升老年福祉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能够通过改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压力、增加老年人的社会角色感知间接提升其福祉水平。政府信任、社会联系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能够增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提升效应。文章为更好发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福祉效能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老年福祉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但随着我国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和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农村地区老年群体的福祉保障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农村地区老年人口多、支付能力弱、基础设施差、辐射范围广等现实条件，当前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资源供给难以满足养老需求，导致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为了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2024年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健全农村留守、高龄、失能、残疾等老年人探访关爱和应急救援服务机制。”^①

互助养老服务是一种基于互惠原则的养老服务交换活动，促进了养老资源从个人自给自足向集体互助的转变。与其他养老模式中老年人依赖于家庭成员、养老机构相比，互助养老依赖于老年人自身的劳动力，强调老年人之间相互帮助和团结互助、来满足各自的生活照料和精神

[作者简介] 朱一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养老保障与社会发展。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人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保障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24JZD039）；陕西省博士后科研项目“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需耦合关系与政策支持路径仿真研究”（2025BSHSDZZ002）。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26/202501/content_7001310.html，2024年12月30日。

情感交流需求。从实践情况来看,互助养老服务根植于农村熟人社会长期形成的人情契约与互惠传统,其供给主体以地方政府和村庄内生力量为主。在政策扶持下,农村社区依托村委会或其他地区机构,逐步建立了互助幸福院和其他形式的互助养老服务机构。这些服务机构通常由村两委或当地老年协会牵头,村委会负责日常管理,由本村身体较好、劳动能力较强的老年人和专业工作人员共同提供养老服务。为了降低老年人的经济压力,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村集体的经济支持和国家政策的资金补贴。

伴随着互助养老服务在农村地区的实践探索,相关学者充分论证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优势。农村居民生活强调集体利益、塑造集体文化,为互助养老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①血亲、姻亲、朋友是大家共有的“历史社会经验”的社会圈子,更容易形成基于信任的互助关心和帮助,构成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内生力量。^②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效能尚不明确,难以指导未来政策发展。因此,本研究从福利视角切入,实证探讨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边际贡献在于:其一,引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合作生产理论和积极老龄化的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影响老年福祉的理论分析框架,完善了互助养老服务从个体参与到福祉提升的理论逻辑。其二,探索性地剖析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为准确评估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效能提供了实证依据。其三,考察了晚年生活压力、社会角色感知的中介效应,以及政府信任、社会联系和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为不同情境下更好释放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福祉效能提供了干预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理论引入及框架构建

本研究聚焦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及机制,引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合作生产理论和积极老龄化的相关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福利多元主义为解释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影响的关系提供了基本支撑。随着互助养老实践中福利服务提供者由政府部门向多元主体转变,鼓励身体条件较好的老年人作为志愿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养老服务,从而提升整体福祉水平。社会支持理论和积极老龄化的相关理论为理解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影响老年福祉的内在路径提供了理论基础。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提供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老年人抵御晚年生活压力造成的负面影响,提高其福祉水平。积极老龄化的相关理论认为,应当根据老年人自身的意愿和能力,为老年人提供参与各类社会活动的机会,从而改善其福祉状况。合作生产理论进一步解释了政府信任、社会联系和地方依恋如何调节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在合作生产模式下,公共部门利用社会资源和能力来弥补公共投资减少,分担了公共服务的成本,因此如何确保老年人作为养老服务的利益相关者愿意投入资源以提升服务供给质量和范围,是互助养老服务能否有效产生服务效能的关键。

① 代秀亮:《农村互助养老:社会基础、历史演进与发展路径》,《社会保障评论》2025年第2期。

② 刘妮娜:《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定位、模式与进路》,《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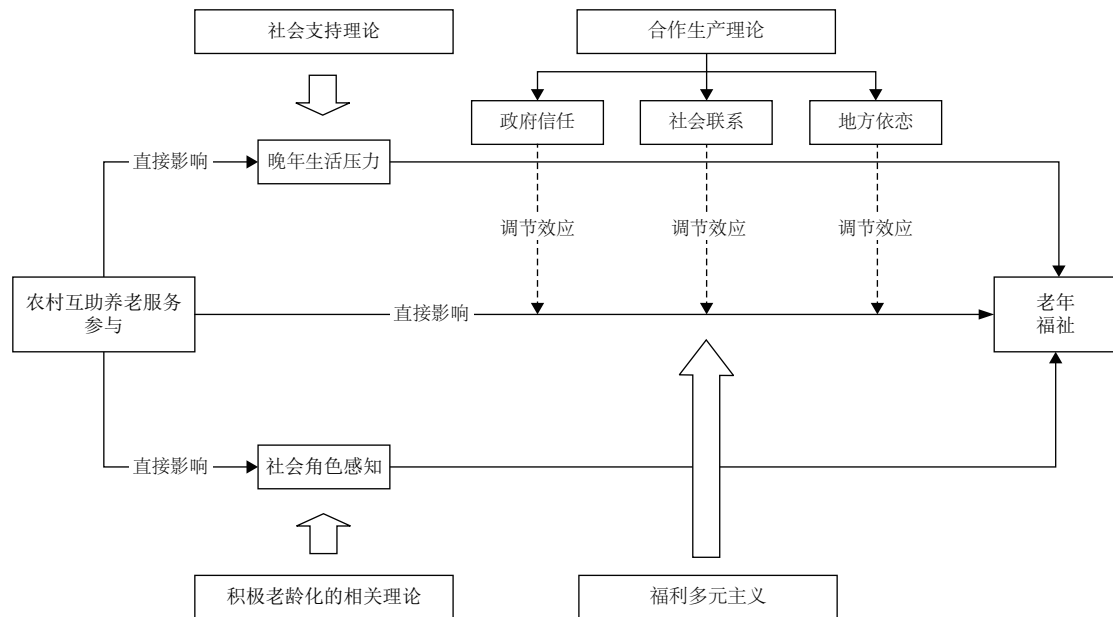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影响的分析框架

(二)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影响老年福祉的理论分析

1. 老年福祉的分析

福祉概念通常可以划分为宏观尺度上的国民福祉和微观尺度上的个体福祉，传统的福祉理论将个体福祉归纳为两类。客观主义福祉理论主张从个人实际消费支出、个人基本商品和个人拥有的资源量的角度来定义和衡量福祉。^①但客观福祉理论将福祉视为一种物质上的指数进行数量比较，仅依靠客观福祉的测量难以反映福祉的多元性。与之相对，主观福祉理论认为福祉是一种效用，主要受到心理评价和主观感觉的影响，例如“幸福感”“满足感”的情绪价值。此外，Rawls提出的“基本善”理论指出，收入、资源、权利、机会、自由、财富、以及自尊统称为“基本善”，均是可以评估个体福祉的不同视角。^②

相较于“个体健康”“幸福感”“生活质量”等概念，“福祉”是一个整合性、多维度的概念。其中，客观福祉包括客观条件和客观机会，涉及健康、教育、物质生活水平，社会交往等。主观福祉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以老年福祉作为研究对象，需要考虑晚年生活环境下个体的生活特点和数据可获取性，才能获得老年人个体福祉的真实评价。聂建亮将老年福祉分为经济福祉中的收入、消费支出和非经济福祉中的闲暇、家庭关系和心理。^③韩浩综合了几种福祉观，提出老年福祉应当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负面情绪、生活质量、收入和消费水平等方面测量。^④但就具体的测量框架和维度，学者们还未达成一致。参考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本研究将老年福祉划分自评健康、经济状况、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四个维度。

① Huan Li, et al., "Has Farmer Welfare Improved afte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ircul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3.

② John Rawls, "The Priority of Right and Ideas of the Good,"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88, 6(1).

③ 聂建亮：《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的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对湖北省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④ 韩浩：《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人福利的影响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2.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影响老年福祉的分析

在农村养老服务领域,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剧、青壮年外流、经济基础薄弱等问题交织,依靠单个供给主体无法形成可持续的服务保障,难以实现公共福利的长远发展目标。^①而福利多元主义鼓励福利来源的多元化,通过不同部门的责任共担和资源共享实现福利目标。^②一方面,这意味着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中除了政府外,私人部门、志愿组织、社区、家庭及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这种多元参与能够整合更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为全面和多样化的支持和服务,以提升老年福祉。另一方面,各参与主体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中有不同的责任和分工,例如政府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互助养老服务相关政策和法规,社区承担着互助养老服务的组织和管理职责,而老年人个体是互助养老服务提供的重要力量,因此老年人积极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是其福祉提升的关键路径。基于此,提出假设 H1:

假设 H1: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能够提高老年福祉水平。

(三)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影响老年福祉的作用机制分析

1. 中介效应分析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通过社会支持可以改善个体的状况,减轻压力和负面事件对各种结果的影响。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面临着衰老过程带来的消极影响,可能引发特定的健康风险、抑郁情绪或感受到与社会的脱节和孤立。而来自不同社会主体提供的社会支持措施会对压力事件引发的需求做出响应,通过压力缓冲机制减轻负面影响。^③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中既包含政府、企业和社区提供的正式支持,也包含邻里、朋友提供的非正式支持,能够帮助老年人减轻压力和负面事件对各种结果的影响,提高其福祉水平。基于此,提出假设 H2:

假设 H2: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可以通过降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压力提升其福祉水平。

与积极老龄化相关,角色理论认为老年人在晚年时期,社会角色的减少可能使老年人产生归属感的缺失,减少他们与他人互动的机会。^④连续理论认为老年人如果能够保持中年时代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使其能够保持个人生活的连贯性,帮助他们在社会中定位自己,避免角色转换带来的冲突。^⑤活动理论也明确要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有意义和有目的的活动来适应晚年生活,老年人提供互助养老服务能够使他们对社会有所贡献,提升自我效能感。因此通过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可以增加老年人的社会角色感知,以志愿服务弥补晚年社会角色的缺失,从而保持老年人和社会的联系,提高其福祉水平。基于此,提出假设 H3:

假设 H3: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可以通过增加老年人的社会角色感知提升其福祉水平。

2. 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老年人自身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因此他们在服务参与中的决策会受到其对合作关系认知的影响。相关研究认为,在公众参与的合作生产中常会遇到

① 聂建亮:《资源结构、供给形态与需求匹配:农村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路径》,《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5期。

② 丁建定:《“新社会风险”下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道路的新选择》,《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4期。

③ Heather Fuller-Iglesias, et al., "Resilience in Old Age: Social Relations as a Protective Factor,"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2008, 5(3).

④ Nicholson Nicholas, "Social Isolation in Older Adults: An Evolutionary Concept Analysis,"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09, 65(6).

⑤ 倪晨旭等:《新时代银龄行动: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23年第2期。

各种复杂情况,当公众面临预期回报不稳定的公共政策时,很容易出现公共恐慌和个体焦虑,^①当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时,会提升公众对政策本身的信任和认同,使得公共政策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影响老年福祉的关系中,高度的政府信任使得老年人相信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政策可以得到落实,对参与服务产生收获回报的预期,做出积极参与集体合作的理性决定。基于此,提出假设 H4:

假设 H4: 政府信任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在合作关系中,当参与者拥有良好的社会联系时,会增加个体获取信息和互助的机会,促进集体合作的形成。如果个体间关系密切,为了维护这种关系,他们更可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如果个体间仅仅是点头之交的“熟人”,在提供帮助时可能会更为保守。^②因此,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影响老年福祉的关系中,高度的社会联系有助于推动互助养老服务的生产及质量,从而增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设 H5:

假设 H5: 社会联系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考虑合作生产关系的发生场域,在合作生产中地方依恋往往有助于促进资源的整合,因为具有地方依恋的个体通常对特定地区存在深厚情感和认同,这种情感和认同可以促使个体或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当地的公共活动中。^③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语境中,地方依恋强调的是老年人对村庄、居民的情感和价值观,地方依恋程度高的老年人往往对所在社区有深厚的感情和认同感,在服务参与中更容易与其他老年人建立起紧密的情感联系,从而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提升其福祉水平。基于此,提出假设 H6:

假设 H6: 地方依恋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收集于 2021 年研究团队开展的“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和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陕西省、河北省与江苏省作为研究区域,以上三个地区均较早推行农村互助养老政策,这为本次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实证基础。

调研设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分三层在全国范围内计划抽取 900 位农村老年人和他们所在村域作为样本进行调查,其中第一层在全国范围内选取陕西省、河北省和江苏省,第二层每个省内随机抽取 8—10 个左右的县域,第三层在每个县域内随机抽取 2—3 个村,先对每个村的村干部进行调查和访谈,再在每个村庄中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 10 至 15 名农村老年人作为研究的样本对象。

① 晋荣荣等:《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兼论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② Coleman Jame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③ 贾衍菊等:《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 年第 3 期。

为了深入了解不同地域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情况和生活状态,课题组招募了来自陕西、河北和江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寒假期间返回故乡开展调研工作。优先考虑有社会调查经验的学生,两两形成一组,从来自上述省份农村地区的学生中选择志愿者,经筛选共有 116 名、58 组学生参与调研。为了把控调研质量,一人负责提问、帮助老人准确理解和回答问卷,另一人负责记录。调研团队成员分别在其所在地或邻近的农村地区开展了问卷调查,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在数据录入和清洗后,最终获得了 58 个行政村的研究资料和 796 份有效样本。

(二) 变量测量

1. 老年福祉的测量

本文借鉴世界价值观调查对福祉测量的相关指标,从自评健康、经济状况、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四个维度对老年福祉进行测量。世界价值观调查作为全球性的研究项目,涉及数十个国家,问卷中的问题通常经过预测试和验证,以确保其能够准确反映受访者的观点和态度。具体来看,自评健康反映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反映了农村老年人在面对生活、医疗和养老等方面所需经济资源的压力和挑战,生活满意度是指老年人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积极情绪是老年人在面对晚年生活时所持有的乐观、主动和自我实现的心理观念。^①

在各维度的测量中,参考相关研究,^②使用本调查问卷中“您觉得您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一题测量老年人的自评健康,赋值 1—5 表示从非常差到非常好。在经济状况的测量中,考虑到储蓄在不同地区的实际购买力可能有很大差异,使用“您的经济状况带给您的压力”一题,反映其个人或家庭经济资源能否有效覆盖生活开支、医疗护理费用等必要经济需求,赋值 1—5,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的经济压力越小。生活满意度使用“您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吗”这一题项测量,赋值 1—5 表示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在积极情绪的测量中,由于老年阶段个体多经历身体衰老、社会角色转变、亲友离世等多重压力,积极情绪关注老年人在面对晚年生活时所持有的乐观、主动、自我实现的心理观念。使用调查问卷中的“您觉得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是感到快乐、满足和充满希望的吗?”这一题项测量,赋值 1—5 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在总体福祉水平的测量中,由于各维度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评分,四个维度加总可以得到总体福祉水平。

老年福祉的总体特征如表 1 所示。自评健康为一般及以下的占比接近一半,说明调查区域的老年人自评健康平均水平较低,反映了当前农村地区需要加强对老年人的健康指导和慢性病管理,以有效应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经济状况的均值为 3.29,说明农村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面临着较大的经济问题,这一方面来自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经济发展差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依然不足。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都比较高,说明农村老年人往往持有乐观的生活态度,对未来充满希望,其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期望可能更为现实、较容易感到满足。

表 1 老年福祉的总体特征

变量	评价等级	
老年福祉	均值: 14.57	标准差: 2.96

① 白增博等:《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

② 焦开山、包智明:《社会变革、生命历程与老年健康》,《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1 期。

变量	评价等级				
	自评健康	3.14% (非常差)	14.82% (比较差)	27.89% (一般)	36.93% (比较好)
经济状况	10.43% (非常大的经济压力)	18.84% (比较大的经济压力)	24.50% (一般的经济压力)	23.62% (比较小的经济压力)	22.61% (没有经济压力)
生活满意度	1.38% (非常不满意)	5.53% (比较不满意)	22.99% (一般)	44.72% (比较满意)	25.38% (非常满意)
积极情绪	0.63% (非常不同意)	4.90% (比较不同意)	22.99% (一般)	46.61% (比较同意)	24.87% (非常同意)

2.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的测量

老年人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参与内容可以划分为利用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文化娱乐和精神慰藉四个方面，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精神慰藉和组织管理五个方面。其中生活照料旨在帮助老年人完成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活动，包括为老年人提供餐饮、清洁以及上门维修等。医疗护理主要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如医疗咨询、慢性病管理、陪同看病就医等。文化娱乐包括兴趣小组、打牌、唱歌、广场舞等。精神慰藉服务关注老年人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包括心理咨询与疏导、陪同聊天、电话探访等。组织管理服务是指通过参与老年协会、村民小组等互助组织，帮助制定互助养老服务的管理规范、动员培训志愿者以及监督工作质量等。基于对服务内容的界定，通过老年人是否利用或提供过以上各类服务进行测量，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

老年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参与情况如表2所示。在农村互助养老中文化娱乐受众最多，也相对容易获得，因此相关活动得以广泛开展。其次为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这两项服务主要聚焦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随着年岁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功能逐渐衰退，各种慢性病和心理健康问题随之增多，因此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成为其较为迫切需要的服务。在提供方面，文化娱乐和精神慰藉的比例较高，可能因为这两项互助内容对老年人的专业技能与经验要求不高，而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组织管理具有一定的培训难度和专业要求，因此老年人参与比例相对较低。

表2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情况

服务类型	利用	未利用	提供	未提供
生活照料服务	12.44%	87.56%	30.40%	69.60%
医疗护理服务	37.81%	62.19%	36.06%	63.94%
文化娱乐服务	58.42%	41.58%	41.33%	58.67%
精神慰藉服务	19.85%	80.15%	39.95%	60.05%
组织管理服务			25.38%	74.62%

3. 机制变量的测量

(1) 晚年生活压力和社会角色感知的测量

关于晚年生活压力，借鉴相关研究，^①使用问题“晚年生活对您造成的压力大吗”进行衡量，

① 陈立新：《北京市老年人心理压力状况分析》，《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2期。

赋值包括1—5表示压力从非常大到压力非常小。该变量反映了老年人在应对晚年一系列挑战时所产生的心理负荷与紧张状态。

关于社会角色感知,借鉴相关研究,^①使用问题“您认为自己在村里处理公共事务时的角色重要吗”进行衡量,赋值包括1—5表示从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该变量反映了老年人对自身所承担社会角色的意义评价。

(2) 政府信任、社会联系和地方依恋的测量

关于政府信任,借鉴相关研究,^②其测量题项分别为“我认为政府值得信任”“我相信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中所做决策的合理性”“我相信政府决策会从本村的利益出发”,1—5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关于社会联系,借鉴相关研究,^③其测量题项分别为“我在村里的朋友很多”“我有困难时大家都会帮助我”“我可以放心地和朋友谈论私事”,1—5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关于地方依恋,借鉴相关研究,^④其测量题项分别为“我喜欢我住的这个地方”“我和村里居民的感情很好”“如果离开村庄我会很想念它”“村庄的环境很好、居住很舒适”,1—5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4.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主要从个体特征、生活方式、家庭支持三个维度进行选择:个体特征中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是否患有慢性病、子女数量、失能状况、是否抽烟、是否喝酒;生活方式中包括居住方式、农业劳动;家庭支持中包括子女关心程度、代际支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岁)	70.42	6.85
性别	0=女性,1=男性	0.51	0.50
婚姻状况	0=无配偶,1=有配偶	0.81	0.39
文化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4=大专及以上	1.51	0.74
家庭收入	实际收入金额(元)	81657.06	85621.93
慢性病	0=没有慢性病,1=有慢性病	0.77	0.42
子女数量	实际子女数量	2.58	1.25
失能状况	ADLs得分:0—6分	0.19	0.90
是否抽烟	0=不抽烟,1=抽烟	0.26	0.44
是否喝酒	0=不喝酒,1=喝酒	0.34	0.47
居住方式	0=独居,1=非独居	0.87	0.34

① 孙意乔等:《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1期。

② 何文盛、何忍星:《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一项调查实验》,《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年第6期。

③ 程新峰等:《社会隔离、孤独感对老年精神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人口与发展》2020年第1期。

④ 王学婷等:《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4期。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业劳动	0= 不参与农业劳动, 1= 参与农业劳动	0.78	0.41
子女关心程度	1= 从不关心, 2= 偶尔关心, 3= 有时关心, 4= 经常关心, 5= 总是关心	3.28	1.14
代际支持	过去一年子女给老人支持的实际金额(元)	2702.14	6701.59

(三) 研究方法

考虑到老年人通常在互助养老中同时扮演着服务利用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角色, 仅统计数量会模糊服务内容的实质差异, 必须兼顾服务利用和提供的内容、类型和数量才能反映其行为组合模式。因此, 采用潜在类型分析方法(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识别老年人利用和提供不同内容服务的类型, 揭示老年人的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偏好。在LCA中, 潜在变量是不可观测的类别变量, 而外显变量是可观测的类别变量。基本的前提假设指出, 各个显性变量所表现出的反应概率分布能够通过少数几个互不重叠的潜在类别变量来阐释, 每个类别在对各显性变量的反应选择上都显示出特定的偏好。^①

借助Mplus 8.3软件, 利用LCA方法构建了农村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的比例结构模型, 以对农村老年人利用和提供不同内容互助养老服务的类型进行分类。其中, 模型中的外显变量为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文化娱乐和精神慰藉四类服务内容的利用行为, 以及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精神慰藉和组织管理五类服务的提供行为, 共计9个二分类变量, 依次设置为Y1—Y9, 因此潜变量可以设置为:

$$\pi_{abcde fghi}^{Y_1 Y_2 Y_3 Y_4 Y_5 Y_6 Y_7 Y_8 Y_9} = \sum_t \pi_t^x \pi_{at}^{\bar{Y}_1 x} \pi_{bt}^{\bar{Y}_2 x} \pi_{ct}^{\bar{Y}_3 x} \pi_{dt}^{\bar{Y}_4 x} \pi_{et}^{\bar{Y}_5 x} \pi_{ft}^{\bar{Y}_6 x} \pi_{gt}^{\bar{Y}_7 x} \pi_{ht}^{\bar{Y}_8 x} \pi_{it}^{\bar{Y}_9 x}$$

式中a、b、c、d、e、f、g、h、i代表互助养老服务利用和提供的9个外显变量取值; $\pi_{abcde fghi}^{Y_1 Y_2 Y_3 Y_4 Y_5 Y_6 Y_7 Y_8 Y_9}$ 表示这9个外显变量的联合分布概率; π_t^x 表示样本数据为某一潜在类别变量x的特定类别t的概率, $t=1,2,3,\dots,T$; $\pi_{at}^{\bar{Y}_1 x}$ 表示归属于第t个潜在类别的老年人个体在外显变量Y1上表现为a的条件概率, 其他外显变量与此一致。

基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参与类型识别结果, 采用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 进一步检验不同参与类型对老年福祉的自评健康、经济状况、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四个维度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当因变量为老年福祉的连续变量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OLS), 当因变量为各维度福祉的有序变量时采用有序结果模型回归方法(Oprobit)。

在机制分析中, 利用SPSS宏程序中的Process执行基于Bootstrap(抽取5000次)的多类别自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②识别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影响的中介机制, 包括检验晚年生活压力、社会角色感知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在对变量中心化处理后, 进一步采用层次回归方法检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影响的调节效应,^③包括政府信任、社会联系、地方依恋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类型对老年福祉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① 宋璐:《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研究》,《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4期。

② 温忠麟等:《国内中介效应的的方法学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8期。

③ 卢谢峰、韩立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与协变量——概念、统计检验及其比较》,《心理科学》2007年第4期。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参与类型分析

通过潜在类型分析方法,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 4 种利用行为和 5 种提供行为进行分析。根据模型依次估计了 1 至 9 种潜在类别的模型参数,以进一步匹配最优类别。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在依次检验了 5 种潜在类别后,发现从模型 1 至模型 4 类别数目中的 L2 指数、AIC 指数、BIC 指数和 ABIC 指数依次下降,至模型 5 时 BIC 指数上升,同时模型中 LMR 和 BLRT 值始终在 $P < 0.01$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在模型 4 中总样本中分为 4 类时是模型的最优结果。此外,ENTROPY 指数在模型 4 中为 0.81,说明模型分类的准确度在 90% 以上。

表 4 参与类型的潜在类别模型检验结果

类别数目	L2	AIC	BIC	ABIC	ENTROPY	LMR(p)	BLRT(p)
1	-4299.33	8616.65	8658.77	8630.19			
2	-4057.75	8153.50	8242.41	8182.08	0.91	<0.01	<0.01
3	-3897.06	7852.12	7987.83	7895.74	0.83	<0.01	<0.01
4	-3846.20	7770.39	7952.89	7829.05	0.81	<0.01	<0.01
5	-3822.31	7742.62	7971.92	7816.32	0.79	<0.01	<0.01

在确定参与类型的最佳模型后,进一步基于条件概率判断 4 类服务利用和 5 类服务提供判断农村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的类别倾向,结果如图 2 所示。其中,条件概率用于衡量观察到的指标变量与潜在类别之间的联系程度,其取值在 0 到 1 之间。当数值接近 1 时,表明变量与潜在类别之间有强烈的关联;反之,若接近 0,则说明两者之间的关联较弱或几乎不存在。通过分析条件概率,可以揭示出每个潜在类别的独特属性,并据此将不同的类别进行区分。因此,借助各个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可以归纳出潜在类别的特征,进而识别并命名互助养老服务参与的潜在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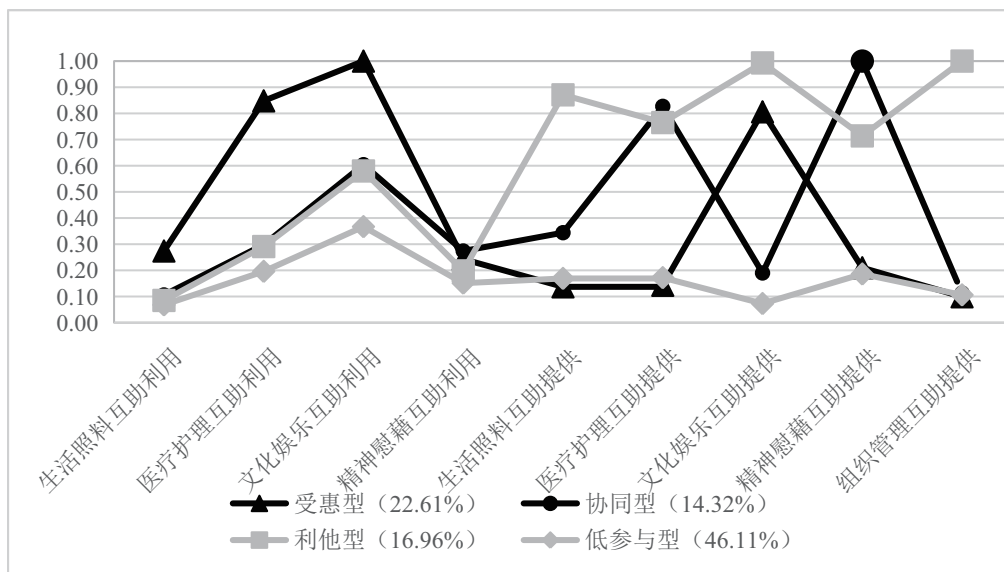


图 2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参与类型识别

基于各服务内容的条件概率可以将互助养老服务的参与类型划分为“受惠型”“协同型”“利他型”和“低参与型”四类。其中,“受惠型”老年人利用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文化娱乐的

条件概率均为四种类型中最高水平,分别为 0.27、0.85 和 1.00,且提供内容中只有文化娱乐水平最高,主要扮演着接受服务和帮助的角色。“协同型”老年人利用水平与其他类型相当,提供服务中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的条件概率较高,分别为 0.83 和 1.00,在整个互助养老过程中既接受他人的帮助,同时也能够为其他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利他型”老年人五项服务提供内容的条件概率均在 0.70 以上,主要扮演着为其他老年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角色。“低参与型”老年人服务利用的条件概率均为四种参与类型最低,且服务提供的条件概率均未超过 0.20,在整个互助养老体系中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尽管他们可能并不需要大量的养老服务,但也不愿意向他人提供服务。

(二) 基准回归分析

表 5 模型 1 采用 OLS 模型,汇报了设置“低参与型”为参照组时,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其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低参与型”,“受惠型”“协同型”和“利他型”的老年福祉水平更高,假设 H1 得以验证。这是由于“受惠型”“协同型”和“利他型”均比“低参与型”在整个互助养老过程中能够接受和提供更多服务。通过利用服务能够帮助老年人进行疾病预防和管理,提升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此外还能通过文化活动帮助老年人缓解压力,进而促进个体的老年福祉水平。通过提供服务使老年人有机会结识新朋友并发挥余热,增强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意义从而有助于提升其福祉水平。

表 5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老年福祉	自评健康	经济状况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
参与类型(参照组:低参与型)					
受惠型	1.090***	0.232**	0.249**	0.561***	0.223**
	(0.249)	(0.097)	(0.099)	(0.104)	(0.102)
协同型	1.004***	0.253**	0.275**	0.476***	0.098
	(0.270)	(0.119)	(0.114)	(0.106)	(0.116)
利他型	0.986***	0.165	0.112	0.659***	0.273**
	(0.260)	(0.105)	(0.113)	(0.104)	(0.108)
年龄	0.056***	0.007	0.025***	0.018***	0.012*
	(0.017)	(0.007)	(0.007)	(0.007)	(0.007)
性别	-0.211	-0.061	-0.229**	0.100	0.045
	(0.242)	(0.094)	(0.096)	(0.098)	(0.095)
婚姻状况	0.100	0.066	-0.019	0.007	0.071
	(0.256)	(0.101)	(0.098)	(0.106)	(0.100)
文化程度	0.647***	0.185***	0.292***	0.028	0.210***
	(0.127)	(0.056)	(0.057)	(0.058)	(0.057)
家庭收入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慢性病	-1.357***	-0.619***	-0.261***	-0.450***	-0.286***
	(0.228)	(0.094)	(0.098)	(0.095)	(0.093)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老年福祉	自评健康	经济状况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
子女数量	-0.099	-0.018	-0.088**	0.009	0.021
	(0.088)	(0.034)	(0.037)	(0.034)	(0.033)
失能状况	-0.484***	-0.146**	-0.136***	-0.079	-0.149***
	(0.160)	(0.064)	(0.045)	(0.049)	(0.054)
是否抽烟	-0.345	0.047	-0.188*	-0.070	-0.166
	(0.246)	(0.099)	(0.098)	(0.105)	(0.104)
是否喝酒	0.590**	0.231**	0.232**	0.042	0.087
	(0.232)	(0.090)	(0.094)	(0.094)	(0.092)
居住方式	-0.120	-0.147	0.090	-0.004	-0.149
	(0.317)	(0.116)	(0.132)	(0.127)	(0.127)
农业劳动	0.064	0.244**	-0.063	-0.062	-0.078
	(0.250)	(0.100)	(0.089)	(0.097)	(0.105)
子女关心程度	0.357**	0.071*	0.134***	0.055	0.136***
	(0.094)	(0.036)	(0.037)	(0.037)	(0.036)
代际支持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常数项	9.014***				
	(1.375)				
样本数	796	796	796	796	796
R-squared	0.191				
pseudo R ²		0.055	0.048	0.053	0.04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模型 2—5 采用 Oprobit 模型，检验不同参与类型对老年福祉的自评健康、经济状况、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四个维度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从模型 2 来看，“受惠型”和“协同型”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利他型”估计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受惠型”“协同型”参与的互助养老服务利用水平更高，通过利用服务能够照顾老年人的日常饮食，为其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从而改善其健康状况。“利他型”老年人提供互助养老服务水平较高，但利用水平较低。考虑到可能是农村老年人由于自身专业能力和医疗健康知识限制，往往只能提供有限的陪同看病和生病照护，难以通过改善健康素养间接提升其身体健康水平，^①因此“利他型”老年人虽然扮演着为其他老年人提供帮助的角色，但并不能改善自身的健康水平。

从模型 3 来看，相对于“低参与型”，“受惠型”和“协同型”参与均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经济状况，但“利他型”参与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受惠型”和“协同型”的老年人服务利用水平更高，而“利他型”老年人的服务利用水平和“低参与型”相当。通过互助养老服务利用，老年人可以在不需要支付高昂费用的情况下获得基本的生活照料、慢性病管理、生

① 李卓等：《数字健康素养与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关系研究：基于体育锻炼行为的中介效应》，《中国体育科技》2023 年第 12 期。

病照护等服务,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养老开支、改善经济状况。^①

从模型4来看,相对于“低参与型”,“受惠型”“协同型”和“利他型”参与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行为模式推测,“受惠型”老年人的服务利用的条件概率均为四种类型中最高水平,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所需的各种帮助,从而提升老年生活满意度。“协同型”老年人既接受他人的帮助得到相应支持,同时也能够为其他老年人提供服务获得情感满足,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利他型”老年人积极参与到服务提供中,有助于老年人收获来自本地社区、被照顾者的感激之情,增强其责任感和社会地位、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

从模型5来看,与“低参与型”相比,“受惠型”和“利他型”参与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积极情绪,但“协同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受惠型”老年人通过利用服务,既获得生活支持、医疗支持,也获得了与他人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和隔离感,从而降低抑郁的风险,提升老年人的积极情绪。“利他型”老年人通过提供互助养老服务获得了社会参与感和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其积极情绪。^②而“协同型”老年人对积极情绪的提升不显著,可能是在农村熟人社会下互助行为会成为隐形的行为规范,“协同型”老年人更多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去参与互助养老服务,影响其积极情绪获得。^③

(三) 中介效应分析

1. 晚年生活压力

利用SPSS宏程序中的Process执行基于Bootstrap(抽取5000次)的多类别自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具体验证方法借鉴Hayes和方杰等人的研究。^④在控制所有控制变量后,晚年生活压力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影响的路径系数如图3所示。这表明与“低参与型”相比,“受惠型”“协同型”和“利他型”参与既能直接提升老年福祉,也能通过改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压力从而提升其福祉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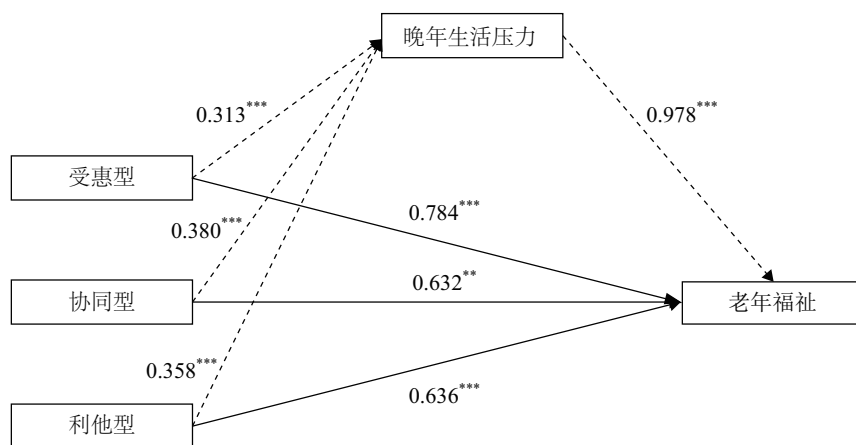


图3 晚年生活压力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影响的路径系数

注:低参与型为参照组,控制了个体特征、生活方式和家庭支持;***、**、*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① 刘欢:《农村老人自理能力、服务需求与家庭贫困关联度分析》,《人口学刊》2017年第6期。

② 倪晨旭等:《新时代银龄行动: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23年第2期。

③ 李彪:《数字反哺与群体压力:老年群体微信朋友圈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3期。

④ Hayes Andrew, Preacher Kristopher J,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with a Multi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 *British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 Statistical Psychology*, 2014, 67(3).

表 6 基于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的结果说明相对中介效应显著, 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H2。进一步分析其效应值发现, “受惠型” 分组对老年福祉的直接效应为 0.784, 间接效应为 0.306, 分别占总效应的 71.93% 和 28.07%; “协同型” 分组对老年福祉的直接效应为 0.632, 间接效应为 0.372, 分别占总效应的 62.95% 和 37.05%; “利他型” 分组对老年福祉的直接效应为 0.636, 间接效应为 0.350, 分别占总效应的 64.50% 和 35.50%。这可能反映出虽然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社会环境中遭受的困难和压力越来越大, 但来自互助养老服务的各种支持能够帮助其减轻压力和负面事件, 这一结果与胡耀岭等的研究结论一致, 互助养老服务能够帮助老年人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①

表 6 晚年生活压力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参照组: 低参与型		效应值	se	LLCI	ULCI	效应量
受惠型	相对总效应	1.090	0.249	0.602	1.578	
	相对直接效应	0.784	0.222	0.348	1.219	71.93%
	相对中介效应	0.306	0.120	0.074	0.547	28.07%
协同型	相对总效应	1.004	0.294	0.427	1.581	
	相对直接效应	0.632	0.262	0.117	1.146	62.95%
	相对中介效应	0.372	0.143	0.098	0.665	37.05%
利他型	相对总效应	0.986	0.276	0.444	1.528	
	相对直接效应	0.636	0.246	0.152	1.119	64.50%
	相对中介效应	0.350	0.133	0.092	0.609	35.50%

2. 社会角色感知

图 4 展示了在控制所有控制变量后, 社会角色感知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影响的路径系数, 结果表明与“低参与型”相比, “受惠型” “协同型” 和 “利他型” 参与既能直接提升个体老年福祉, 也能通过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角色感知从而改善其福祉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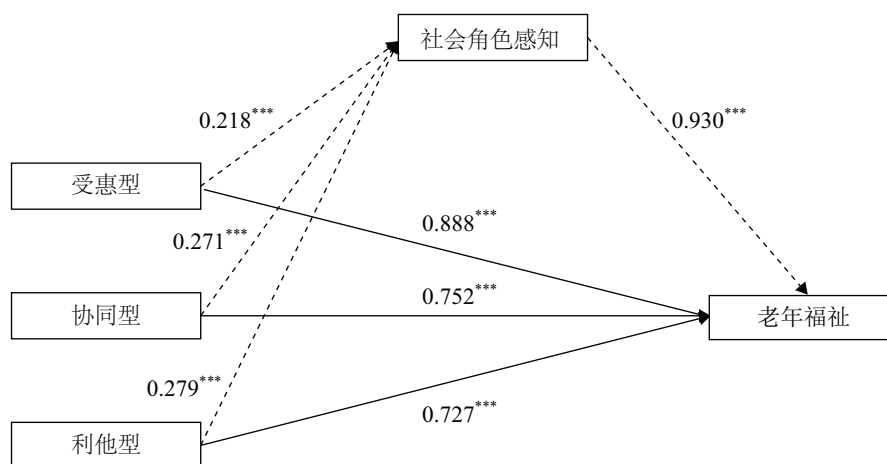


图 4 社会角色感知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影响的路径系数

注: 低参与型为参照组, 控制了个体特征、生活方式和家庭支持; **、*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① 胡耀岭等: 《社会参与对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西北人口》2025 年第 1 期。

表 7 基于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的结果说明相对中介效应显著, 假设 H3 得到验证。进一步分析其效应值发现, “受惠型” 分组对个体老年福祉的直接效应为 0.888, 间接效应为 0.202, 分别占总效应的 81.47% 和 18.53%; “协同型” 分组对个体老年福祉的直接效应为 0.752, 间接效应为 0.252, 分别占总效应的 74.90% 和 25.10%; “利他型” 分组对个体老年福祉的直接效应为 0.727, 间接效应为 0.259, 分别占总效应的 73.73% 和 26.27%。这可能反映出积极参与具有公共性质社区活动能够帮助老年人在社会中定位自己, 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效能感, 这一结果与倪晨旭等的研究结论一致, 互助养老服务作为具有志愿性的服务活动, 能够帮助老年人获得更多的角色认同和社会互动。^①

表 7 社会角色感知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参照组: 低参与型		效应值	se	LLCI	ULCI	效应量
受惠型	相对总效应	1.090	0.249	0.602	1.578	
	相对直接效应	0.888	0.242	0.413	1.363	81.47%
	相对中介效应	0.202	0.069	0.074	0.344	18.53%
协同型	相对总效应	1.004	0.294	0.427	1.581	
	相对直接效应	0.752	0.286	0.190	1.313	74.90%
	相对中介效应	0.252	0.084	0.100	0.426	25.10%
利他型	相对总效应	0.986	0.276	0.444	1.528	
	相对直接效应	0.727	0.269	0.198	1.255	73.73%
	相对中介效应	0.259	0.084	0.101	0.433	26.27%

(四) 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政府信任、社会联系和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 以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参与的 4 种潜类别为自变量, 以总体福祉水平作为因变量, 在控制个体特征、生活方式和家庭支持三个方面干扰的情况下, 采用层次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表 8 设置“低参与型”为参照组, 模型 1 单独考察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类型对老年福祉的影响,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将参与类型和政府信任同时纳入回归方程,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将参与类型和政府信任的交互性纳入回归方程, 通过检验模型 3 中交互项的显著性判断政府信任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中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由模型 3 可知, “受惠型” “协同型” 与 “利他型” 参与和政府信任的交互项均显著正向影响老年福祉, 说明与 “低参与型” 相比, 政府信任在 “受惠型” “协同型” 与 “利他型” 参与和老年福祉之间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H4 得到验证。这可能是由于政府信任度高意味着农村老年人对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有较高的信心, 当政府推行与老年福祉相关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政策时, 这种信任减少了执行过程中的阻力, 使得政策效果能够快速且广泛地覆盖到需要的老年人群; 老年人在利用服务中对服务的接受度和满意度更高, 在提供服务时具有收获回报的良好预期从而积极性更高, 进而增强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提升效应。

^① 倪晨旭等: 《新时代银龄行动: 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2023 年第 2 期。

表 8 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

变量	老年福祉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参与类型 (参照组: 低参与型)							
受惠型	1.090 ^{***}	1.093 ^{***}	1.082 ^{***}	0.842 ^{***}	0.866 ^{***}	0.788 ^{***}	0.789 ^{***}
	(0.249)	(0.249)	(0.249)	(0.216)	(0.214)	(0.236)	(0.238)
协同型	1.004 ^{***}	1.040 ^{***}	1.072 ^{***}	0.511 ^{**}	0.594 ^{**}	0.561 ^{**}	0.596 ^{**}
	(0.270)	(0.268)	(0.267)	(0.250)	(0.252)	(0.257)	(0.258)
利他型	0.986 ^{**}	1.004 ^{***}	1.014 ^{***}	0.556 ^{**}	0.547 ^{**}	0.434 [*]	0.376
	(0.260)	(0.259)	(0.258)	(0.235)	(0.236)	(0.247)	(0.253)
政府信任		0.148 ^{**}	-0.024				
		(0.065)	(0.095)				
受惠型 × 政府信任			0.323 ^{**}				
			(0.159)				
协同型 × 政府信任			0.346 ^{**}				
			(0.166)				
利他型 × 政府信任			0.307 [*]				
			(0.177)				
社会联系				0.569 ^{***}	0.463 ^{***}		
				(0.045)	(0.072)		
受惠型 × 社会联系					0.272 ^{***}		
					(0.102)		
协同型 × 社会联系					0.022		
					(0.125)		
利他型 × 社会联系					0.211 [*]		
					(0.113)		
地方依恋						0.440 ^{***}	0.443 ^{***}
						(0.044)	(0.063)
受惠型 × 地方依恋							-0.013
							(0.104)
协同型 × 地方依恋							-0.083
							(0.107)
利他型 × 地方依恋							0.077
							(0.11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变量	老年福祉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常数项	9.014***	7.429***	9.118***	3.925***	5.315***	3.246**	3.275**
	(1.375)	(1.554)	(1.737)	(1.259)	(1.423)	(1.358)	(1.579)
样本数	796	796	796	796	796	796	796
R-squared	0.191	0.197	0.204	0.339	0.346	0.292	0.29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在社会联系方面，模型 4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将参与类型和社会联系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模型 5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将参与类型和社会联系的交互性纳入回归方程。由模型 5 可知，“受惠型”与“利他型”参与和社会联系的交互项均显著正向影响老年福祉，但“协同型”参与和社会联系的交互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与“低参与型”相比，社会联系在“受惠型”与“利他型”参与和老年福祉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H5 部分成立。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社会联系水平的老年人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中获得的服务质量不同，对于低社会联系的老年人群体而言，由于和其他老年人的关系质量不高，即使其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也难以获得或者向他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因此对自身福祉的提升有限；对于高社会联系的老年人群体而言，和其他社区成员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其更愿意相互付出真诚支持和帮助，从而更好发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正向促进作用。而社会联系在“协同型”参与和老年福祉之间不具有调节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在农村熟人社会下互助行为会成为隐形的行为规范，他们是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去参与互助养老服务，^① 社会联系水平不会影响服务质量，对其老年福祉提升没有促进作用。

在地方依恋方面，模型 6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将参与类型和地方依恋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模型 7 在模型 6 的基础上将参与类型和地方依恋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模型的结果显示“受惠型”“协同型”与“利他型”参与和地方依恋的交互项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与“低参与型”相比，地方依恋在“受惠型”“协同型”与“利他型”参与和老年福祉之间均不具有调节作用，假设 H6 不成立。这与之前的研究假设不符，可能的原因是地方依恋会使本地居民对政策效果感知的期望变高，即高地方依恋的本地居民更期望政府政策和行为能够为当地带来更多的正面影响，而实际情况可能未能达到他们的预期结果。^②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识别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参与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可以分为“受惠型”“协同型”“利

① 严红：《熟人社会、面子与村庄公共性再生产》，《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王立剑、朱一鑫：《从“个体”到“社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现实应对》，《行政管理改革》2023 年第 4 期。

② 贾衍菊等：《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 年第 3 期。

他型”和“低参与型”四类。相对于“低参与型”，“受惠型”“协同型”和“利他型”参与的老年福祉水平更高。分维度来看，在自评健康方面，“受惠型”和“协同型”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更高。在经济状况方面，“受惠型”和“协同型”老年人经济状况更好，但“利他型”的老年人经济状况与“低参与型”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受惠型”“协同型”和“利他型”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水平更高。在积极情绪方面，“受惠型”和“利他型”参与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积极情绪，但“协同型”与“低参与型”的积极情绪没有显著差异。在影响机制上，与“低参与型”相比，“受惠型”“协同型”和“利他型”参与既能直接提升老年福祉，也能通过改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压力、增加老年人的社会角色感知间接提升其福祉水平。政府信任、社会联系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保障基础性养老服务，降低老年人晚年生活压力。本研究表明互助养老服务一方面直接为老年人提供了低成本或免费的保障性、基础性服务内容，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和健康需求，另一方面，互助养老服务有助于降低老年人的养老成本、减轻晚年生活压力造成的负面影响，提高其福祉水平。因此，发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促进作用，需要保障基础性服务、降低老年人晚年生活压力。一方面从兜底性出发，针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救助，通过补贴保障其免费利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建立完善困难老年人监测预警和主动发现机制，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及时纳入救助范围。另一方面从基础性出发，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的共性需求，建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基本清单制度，明确服务内容和对象，确保各类老年人群体能按需获得养老服务。推进村级幸福院、互助养老服务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各地区因地制宜在农村社区层面完善互助养老服务体系。

第二，开发老龄人力资源，践行“老有所为”积极老龄观。老年人在晚年时期，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变迁，社会角色的减少可能使老年人产生归属感的缺失，认为自己失去了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减少了与他人互动的机会。而通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可以增加老年人的社会角色感知，从而保持老年人和社会的联系，提高其福祉水平。首先，要厘清老年人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中的定位和责任，对需要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内容进行细化，结合现有养老需求变化和服务缺口制定可量化的服务目标，提升老龄资源的利用效率。发挥政府的社会倡导作用，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社会对老年人贡献的认可，营造积极的社会认同。其次，要提升老年人服务能力，通过开展养老护理、健康管理、应急救援等技能培训，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互助服务能力。有研究发现老年人自身背景会影响其供给互助养老服务的决策，^①因此要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专业技能、社会经验、心理状况以及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激发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供给的动力。最后，以农村基层组织为基础搭建互助养老服务平台，充分调动内部资源支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鼓励有积极意识和丰富管理经验的乡村能人积极参与到幸福院的组织管理中，提升整个农村社区的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① 杨静慧：《农村老人互助养老意愿及政策启示——基于江苏的实证研究》，《兰州学刊》2020年第4期。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Rural Mutual-aid Eldercare Services on Older Adults' Well-being and Its Mechanisms

Zhu Yixi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mutual-aid eldercare services constitutes a critical initiative to proactively address population ageing and improve the policy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eldercare services and the eldercare industry. Drawing on survey data from the special project "Rural Eldercare Service Development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Older Adult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rural mutual-aid eldercare services on older adults' well-being, as well as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articipation in rural mutual-aid eldercare servic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distinct types: "beneficiary," "collaborative," "altruistic," and "low-participation." Compared with the "low-participation" type, the other three participation modes significantly improve older adults' well-being.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rural mutual-aid eldercare services can indirectly enhance older adults' well-being by reducing late-life stress and enhancing their sense of social roles. Furthermore, government trust and social connections play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strengthening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rural mutual-aid eldercare services on older adults' well-being. This paper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better leveraging the well-being-enhancing effects of rural mutual-aid eldercare services.

Keywords: population ageing; eldercare services; rural mutual-aid eldercare services; older adults' well-being

(责任编辑:李莹)